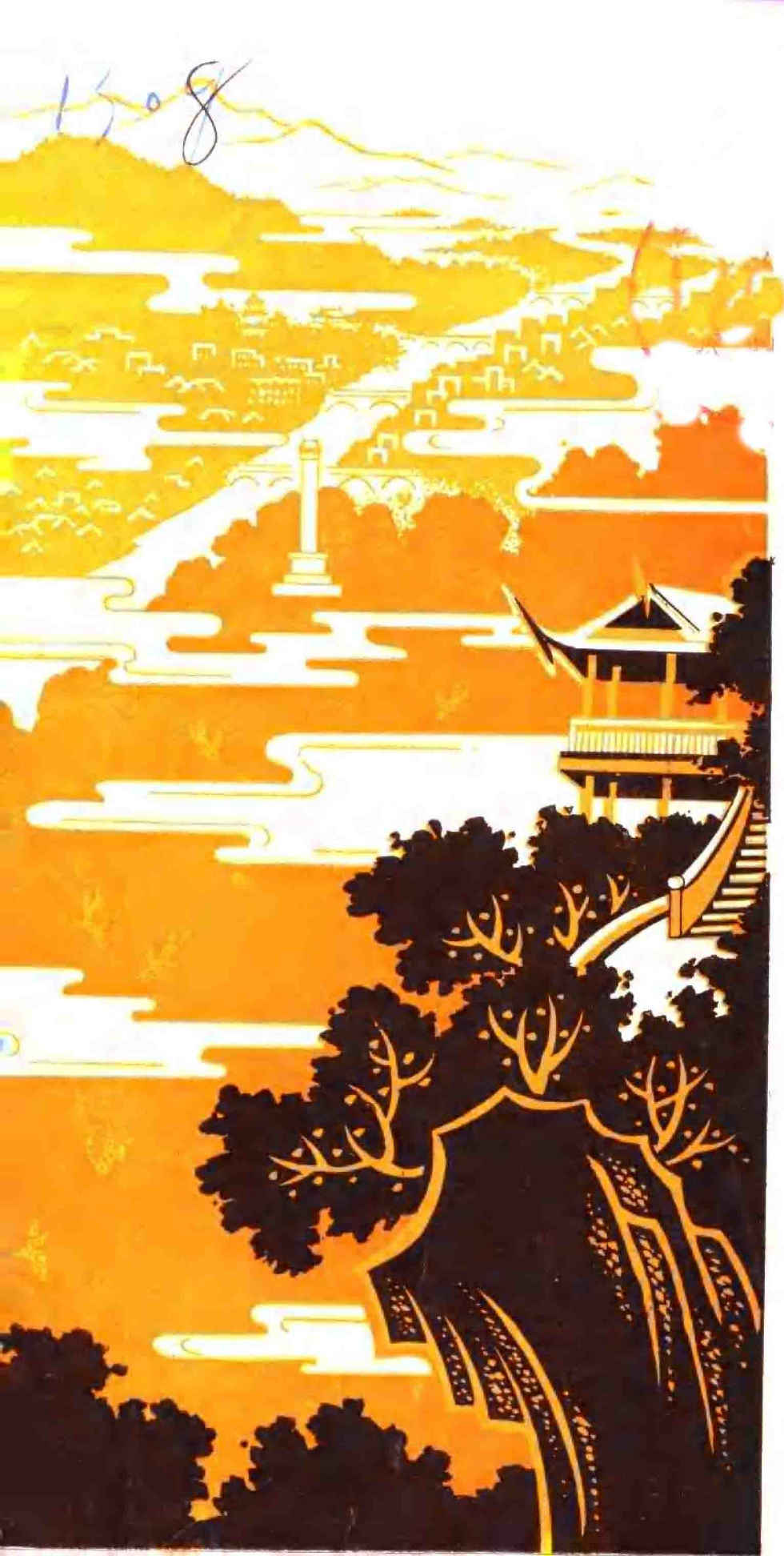




长河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长汀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目 录

1、试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原因·····	李文生 (1)
2、长征路上“白军工作部”的片断回忆·····	谢正标 (8)
3、跟随陈云同志长征·····	秋 荣 (10)
4、略谈长汀的扩大红军·····	王其森 (13)
5、太平军四次下汀州·····	范启龙 (16)
6、汀州辛亥光复史料辑录·····	范启龙 (27)
7、长汀金融史漫话·····	毛 星 (33)
8、毛铭新印刷所 史 略 ·····	<u>毛守信</u> (38)
9、我所知道的福音医院·····	李家度 李阳明 (43)
10、长汀莲花水库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范汝森 (45)
11、文天祥抗元斗争事迹片断·····	汤家庆 (47)
12、宋慈与《洗冤集录》·····	林衍仁 (50)
13、清朝名医黄卓尔《医鼎阶》简介·····	枫 林 (53)
14、黄仪臣其人其药·····	黄峰林 林衍仁 (55)
15、长汀历代救灾政策实施情况及利弊·····	阙金水 (56)
16、黄埔一期的肖乾·····	亮 节 齐 庭 (60)
17、民国时期长汀县政务机关概况·····	张从安 邱云源 (62)
18、长汀剿匪杂记·····	途中平 (68)
19、汀水汇灵集（长汀历代诗选）·····	邹子彬 (72)
蝶恋花（赠修省烈士的母亲沈娥英同志）·····	曹培基 (44)
封二、封三、图片·····	邓木榕

试论中央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原因

李文生

今年十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长征一开始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下，中央苏区军民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因此，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认真地分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原因，从中应吸取什么教训，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颇为有益的。

一

我们知道，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指引下，连续取得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四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久，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设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由蒋介石直接掌握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的军政大权。同年九月，投入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五十万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那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我双方的兵力及其兵力部署，战略战术的基本情况如何呢？

1、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围剿”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战术。

蒋介石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五十万兵力，归蒋介石为首的南昌行营直接指挥。部队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赣、粤、闽、湘、鄂五省的军队，分别划分为东、西、南、北四路进攻中央苏区。由何键任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任北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东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负责。其中，北路军属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围剿”主力，共十五个师。西路军的兵力次之，为十四个师。各路兵力共选择七个主攻方向，三个在北路，目标是占领永丰、广昌和建宁，西路首先攻打兴国，南路攻打会昌，东路攻打汀州和宁化，最后吃掉整个中央苏区。十月上旬，各路兵力正式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

“进剿”。

在战略战术上，蒋介石在强调“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基础上，从军事战略战术上总结了对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新军事原则”，将过去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改变为“战略进攻，战术防御”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决定在第五次“围剿”中对中央苏区采用碉堡推进政策，避免同红军打运动战，迫使红军打阵地战，“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①在对中央苏区的七个主攻方向上，敌均用碉堡推进，象楔子一样步步插进中央苏区的核心，实行分路“清剿”，然后在持久战中逐步地消耗红军主力，达到消灭红军之目的。这种碉堡推进政策，正是蒋介石推行“新军事原则”的中心环节。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的，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在庐山设立以陈诚为团长的军官训练团，先后抽调了七百五十多人，分三期由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然后分派到军队中担任要职，执行其“围剿”的新战略。

2、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兵力部署及其战略战术。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之时，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和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的兵力达十万余人。此外，还有大批的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主力红军总建制为第一方面军，辖一、三、五、七军团。其中红一军团下辖一、二、三师，红三军团下辖四、五、六师，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十四师，红七军团下辖第二十、二十一师。从九月下旬至十月初，其主力部队奉中央军委和方面军总部命令，陆续开赴中央苏区北线，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北路军的“进剿。”

面对蒋介石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中央苏区军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遇到了同前四次“围剿”许多不同的新问题。一是敌强我弱的情况更为突出。二是红军部队不能象前四次反“围剿”那样，在根据地内部采取大规模运动战以歼灭敌人。但是，敌人的碉堡战略并不是无法攻破的，敌强我弱的状况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②因为，当时中央苏区已经具备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观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虽是敌强我弱。但中央苏区的红军比起前四次反“围剿”时要强大得多。中央苏区拥有二十一个县，近三百万人民将强有力地参军参战。江西和福建军区所辖的地方红军以及各县红军独立团也将在反“围剿”中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第二，驻在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内的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中央苏区红军同十九路军进行了停战议和，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这就解除了中央苏区的福建后方和侧翼的后顾之忧。

第三、参加“进剿”的各路敌军也不是完全“同心协力”的。特别是南路军和西路军是持不积极的态度参与“围剿”的，这就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进剿”最为积极的北路敌军。

第四、中央苏区“红军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③特别是有粉碎敌四次“围剿”的经验。这次反“围剿”，依然可以依靠主力红军打运动战，依靠地方红军在堡垒线打游击战，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达到以运动战粉碎堡垒战，使敌阵地战计划落空的目的。

但是，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占统治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

性变化，不是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而采取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④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轻视堡垒主义，提出“扩大并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进入苏区就把持了红军的战略决策权和指挥大权，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外国军队的战略战术，采用了一套与红军原来正确作战原则完全相反的所谓正规原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大搞所谓的“短促突击”。其结果，这种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正符合国民党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略的需要。而我军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本来可以有条件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都因战略战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而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二

由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在“左”倾机会主义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又一直未能得到纠正，因而整个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不能自拔，最终导致整个反“围剿”的失败。纵观其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无法打开局面。这一阶段从一九三三年十月至十二月，在“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左”的口号下，对敌实行盲目的战略进攻，使红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正值敌占领黎川之时。博古，李德等慑于黎川一城之失，严厉指责红军的撤出是“罗明路线”的“逃跑似的慌忙撤退”。他们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盲目命令在福建的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回师江西，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

十月四日至七日，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吴奇伟的第六师打了一个遭遇战。这一仗共消灭敌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缴获敌小汽车。这一仗本是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军几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带有一点偶然性。可是，“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⑤并硬是夸大它的普遍意义。这样一来，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在整个中央苏区的各战线全部推开了。十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左”倾机会主义者甚至命令红军主力，盲目进攻白区有敌重兵把守的硝石、资溪桥等，结果均不能获胜。失败后又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扰了他们的决心和各个军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这一步强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一、三、五军团和新组建的第九军团进攻敌重点防守的南斗、南城，黎川等堡垒要塞，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敌守备巩固的吉水、永丰等阵地，结果均使我军兵力受到不小伤亡。如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黎川以东的团村伏击敌军，也只打了一个意义不大的击溃仗，俘虏敌军不到千人。对此，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红一军团与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消灭之二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⑥

团村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左”倾机会主义战略方针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苦战，不但无法打开局面，反而越打越被动，损兵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不得不命令红军停止进攻，从白区撤回根据地内部，转入战略防御，而这种战略防御又是极为消极的。

2、正当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之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未能充分利用“福建事变”的有利条件，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

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从白区退回根据地内部，转入防御阶段之际，第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红军的主力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关键。

“福建事变”发生后，福建人民政府派吴明为代表来到根据地谈判。但是，由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党内“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档箭牌干什么？”^⑦放弃了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结果，“我们和他谈判的人把他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⑧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又第二次派徐名鸿为代表到瑞金谈判。这次临时中央虽和十九路军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临时中央不知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拒绝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如彭德怀同志根据蒋介石令其北路军主力入闽“讨逆”的有利时机，电告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⑨毛泽东同志更明确指出：

“红军主力无疑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作战，用这种办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⑩可是博古、李德“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⑪反而批评彭德怀的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⑫并拒绝了毛泽东同志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建议。其结果，“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⑬

由于坚持王明“左”倾错误的党的临时中央对“福建事变”消极观望，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积极的援助和配合，结果使蒋介石从容无阻地镇压了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尔后又从容调集兵力，重新进攻根据地。虽然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行将失败，中央苏区一翼将失去依托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不得不接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一再建议，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但为时已晚，而且，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反而又重申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⑭这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面临更加严重的局势。

3、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消极的战略防御，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由进攻的冒险主义转向消极的战略防御。其兵力部署是：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一、五军团防守南丰西北

一带；红三、七军团防守泰宁、建宁、广昌一线；红军独立第五、七师、模范师、工人师、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防守瑞金、会昌，于都、兴国一线；江西军区部队防守赣江两岸；福建军区部队防守建宁、宁化、长汀一线；红军独立二十四师防守粤赣边界，形成了一个教条的“分兵把守”的被动局面。

同年二月，蒋介石打跨了十九路军，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即集中兵力，重新布署，分东、南、西、北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堡垒推进，共筑碉堡二千九百多个。面对蒋介石的四面包围，堡垒推进，博古和李德“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为了防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⑮红一方面军团在“不放弃苏区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的保守主义号召下，大力推行碉堡对碉堡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种消极的防御主义，使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被动局面。”^⑯

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错误，蒋介石利用我军的保守防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迫使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同蒋介石实行阵地战。四月中旬，敌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二路进攻广昌。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央革委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下达的命令，强调的仍是李德单纯阵地战的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使用有纪律之火力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⑰为了死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方面军一、三、九军团九个师协同作战，命令红军在广昌外围修筑“永久性”的碉堡工事，以防止敌人进攻广昌。李德还亲上前线，指挥死守广昌。对此，彭德怀同志再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三军团一万二千，将全部毁灭。”^⑱但博古、李德并没有接受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从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红一、三、九军团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统一指挥下，“死守广昌”、“寸土必争”，进行了历时十七天的广昌保卫战，其结果保卫战失败，红军指战员共伤亡四千多人。

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红军兵力的巨大消耗，在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彭德怀等对这种消极的“阵地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博古、李德仍继续坚持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其结果又于五月十六日导致了建宁战役的失败，敌进占建宁。六月一日，敌人又相继进占永安、连城。红一、三、七、九军团被迫退守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红一方面军在广昌、建宁等战役的失败，说明“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完全没有可能，”“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⑲毛泽东同志为此向中央明确提出：“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博古、李德对“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⑳

由于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一意奉行消极防御，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等的正确主张，使中央苏区红军在复杂、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失利，无法恢复主动地位。一九三四年七月，当敌人的堡垒已向纵深推进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才提出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但为时过晚。九月，敌东路军严重威胁中央苏区东方门户汀州，博古、李德在仓促之中实行逃跑主义的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

三

我们从上述可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告别根据地，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那么，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总的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不是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堡垒主义，而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先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推行消极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从而铸成了历史性的错误。具体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地估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从而直接导致军事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原因。他们完全从主观愿望出发，不切实际地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拒绝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幻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错误集中体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上，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它不顾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已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挫折，尤其是《松沪停战协定》以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局势，盲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②正是这样，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不切实际地提出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实行战略决战的方针，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战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术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因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对适时地实行战略退却，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找有利时机去歼灭敌人，通过在外线作战的胜利打破敌人的“围剿”，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种依据对形势的错误分析而产生的错误方针，死守根据地的每块“国土”，其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第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苏区推行一系列过“左”政策，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九三三年，王明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并占据领导地位后，推动了一系列“左”的干部政策，“左”的土地政策，“左”的工商业政策，“左”的肃反政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左”的扩红政策等，从而，打击和排挤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导同志，搅乱苏区的阶级阵线，破坏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打击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如王明机会主义者，在干部政策

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在福建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在江西苏区开展反“邓、毛、谢、古路线”，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领导同志。福建苏区在短短的一年里，省委书记和各县县委书记在王明一伙的打击下，象走马灯似的被撤换。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刘晓、陈寿昌、刘少奇等以及张鼎丞，谭震霖同志都受到打击和迫害。由于绝大多数坚持正确意见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受打击和排挤，而新提起来的干部又缺乏经验，只能照“左”倾错误去办事，因而势必削弱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它给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第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实行关门主义，否认“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中间阶级的进步作用，未能联合第十九路军共同抗日反蒋，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第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举起了反蒋抗日的独立旗帜，大大分散了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其军事部署，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可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认为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不会同任何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②还要求全党向他们作：“决死斗争”，主张“打倒一切”，结果错过了有利时机。从而坚持和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能不失败了。

第四、共产国际“左”的影响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受共产国际影响最大。王明一伙就是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上台的。代表王明“左”倾错误的临时中央，其推行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策略和口号，有许多是直接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搬来的。因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一进入苏区，临时中央就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这位不懂中国国情的“按图作业的战术家”。甚至，整个第五次反“围剿”都依赖于这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这就不能不加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综合上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集中到一点，它告诉我们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夺取新的胜利。这一根本经验，对于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适用的。

注 释：

①②④⑦⑧⑩⑪《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

③《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

⑤刘伯承《回忆长征》，北京人民出版社。

⑥⑨⑫⑬《彭德怀自述》，四川人民出版社。

⑩⑬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⑪⑮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

⑭⑰《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长征路上“白军工作部”的片断回忆

谢 正 标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所在的红九军团在长汀松毛岭保卫战后，撤退转移往瑞金、于都，刚过于都河，就与堵截我们前进的国民党陈济棠部接火了。我们营担任掩护任务，敌人的迫击炮弹纷纷泻落阵地，成群的士兵分梯队压来，战斗异常激烈。当我们完成掩护任务后，全营伤亡过半，我的班长被炸断了一条腿，自愿留在阵地，为掩护我们撤退，与敌人同归于尽，营长在撤退时也被流弹击倒。我的腰部也负了伤，幸亏没伤骨头，跟上了后续部队。当时规定，走散的战士可就地编入后续部队。于是，我被安排在第五军团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当罗部长的警卫员兼马伕，部里还有个秘书、二个干事，一个通讯员，一共才六个人。“白军工作部”是负责战后俘虏的安置处理工作。我们虽然不要上火线与敌人打仗，却时常和俘虏在一起，给他们上课，根据不同的表现和要求，有的留下当红军，有的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对俘虏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严肃又细致，做好一个俘虏的工作，我们就减少一个敌人，有时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们刚渡过乌江，连队送来一个俘虏，大个头，满脸连腮胡子。耷拉着脑袋，呆呆地望着我们。我端给他一碗水，他颤抖着双手不敢接。

“别怕，那是我们罗部长。”我说道。

“长官，长官……”俘虏沙哑地哀求着。

“坐下，坐下，”罗部长严肃而和气地向他说明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并劝他不要为军阀卖命。

当他明瞭我们的态度后，死灰色的脸恢复了元气，嘴唇上也有了血色。

他姓张，（此后，我叫他老张，他叫我小马伕）贵州人，出身贫苦农家，前年被当地军阀抓壮丁来的。

我安排他吃了顿饭，给了他几块银元。

“谢谢，谢谢！”老张向我弯着九十度的腰连连鞠躬。

“走吧，走吧！”我挥了挥手。心里说，嘿，算你命大，前方少吃了粒“花生米”。

部队进入贵州，打了几个胜仗，占领了遵义城，我部驻扎在外鸡场镇小村庄。真巧，又遇上老张了。

“怎么，你又当俘虏啦？”我有点奇怪。

“不，不是俘虏，是我自己不走留下的。”老张解释道。

原来，老张把几块银元捎回家后，又溜回部队，队伍被红军击溃后，他不跑，反而给我

们送来一支捷克式步枪，十几发子弹。

我高兴地把他拉到住房，哗哗地倒出十几块银元。他红着脸不敢收。我只好对他说：“你不是俘虏，是给我们送枪弹来的，这银元算我送的，捎回家去吧。”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说：“小马伕，你真是好人，你们红军都是好人。”

当时的银元价值还是满大的。我们打下遵义城的时候，筹集了一批款子。抓到了贵州军阀兼省长王家烈的儿子，王家烈托人来讲情，只要红军放回他的儿子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们带着这个花花公子也麻烦，便顺水推舟，又筹集了许多银元。司令部规定每人背五十块，多带的归个人。那沉甸甸的银元，大家都不想要，宁可多带些子弹。我们还把一些银元，衣物分给当地老百姓，他们高兴极了，逢人便说，“红军好，红军好。”

遵义会议后，部队仍然行军、打仗，打仗、行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都打胜仗，与敌人兜圈子，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们战士们斗志昂扬。

然而，白军老张却利用这机会，经常给我们送枪弹来。有一次，他送枪来后，（这是送来的第六枝枪了）却不愿意回去了，托我给部长讲个情，要和我一起当红军，我只好带他去见罗部长。

罗部长接过他的枪说：“老张，当红军是很艰苦的呀。”

“我知道，这是自愿的，红军官兵一样，小马伕和你在一起，从没受打骂。”老张恳求地说。

“你回去多发展几个弟兄，打仗时朝天放枪，有机会给我们多送些枪来，也是为红军工作。”罗部长耐心地劝他，并叫张干事给他开了一张通行条，吩咐他要好好保存。

老张接过通行条说：“我要是回去当了官，就把整个排，整个连带来当红军。”

红军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一路较少战斗。到了安顺场，我们又与尾追之敌打了个小仗。一天，白军老张带来两枝枪，突然又出现在我眼前。

“你真行呀，怎么总能跟着我们。”我惊讶地问他。

“没啥难的，队伍败退时，我不走愿当俘虏。你们走后，我脱掉“老虎皮”到老百姓家躲几天，待有队伍过时，我佯装散兵。”老张喝了口水，一抹胡子，满不在乎地说：“遇到红军，罗部长那条子顶管用的。”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们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呢。

过了大渡河后，我们准备翻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时，白军老张所在的贵州军阀部队没再追踪了。自那次与白军老张分手后，再也没见到他了。然而，他给我的印象却是难以忘怀。一枝、二枝、三枝……一共八枝枪，有中正式的、有捷克式的。他给我们送来了将近一个班的武器。而我们却没花一粒子弹，没流一滴血。

在长征途中，连队时常送俘虏来，我们都认真而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认识到红军和白军的性质之不同。从而瓦解敌军士气。有时，我们自己生活都非常艰苦，还是尽力给他们一些生活必需品或路费。有些留下当红军的士兵，也甘愿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生活，同我们的战士一样英勇作战。我们把做好俘虏工作当作是不流血的战斗。

（陈伟田据口述录音整理）

跟随陈云同志长征

秋 荣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我作为长征队伍中普通的一兵，不由得回忆起漫漫征途上发生的动人情景，陈云首长和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又在我脑海涌现。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那时，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央提出了“扩大一百万红军”的口号。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汀州水东街中心区的几十名少先队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在大埔训练一个月后，开赴清流前线执行任务，在五军团三十四师一〇一团二营五连当战士。经过几次战斗考验，我被提升为班长。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危急，七、八月间，敌人派重兵向高兴圩进攻，我军奉命阻击。敌人的战术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我军也以堡垒对堡垒，搞短促出击，前沿以一部分兵力死守阵地，后面组织冲锋队，等待敌人逼近阵地时，发起冲锋，与敌人死打硬拼，战斗很激烈。敌人用大炮轰炸我方阵地，派飞机袭扰，我红军指战员虽英勇作战，仍不能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我班十一名战士，有五人牺牲，剩下七名战士也多负伤。我在战斗中左手挂花，送兴国后方医院治疗半个月，伤愈后调军团部警卫队受训。一个月后，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我们五军团从兴国出发，渡过于都河向西开进。前头部队常与敌作战，伤员很多，我们警卫排一边检查行军纪律，一边负责收容工作，使伤病员跟上队伍。当时不知道要进行万里长征，只觉得离苏区越来越远了，大家才心中茫然，像蒙上了一层迷雾。

仲冬时节，部队进入湖南境内。一天晚上，排长通知我和王元球去军团部报到。在司令部，一位首长接待了我们，笑着说：“从今天起，你们二位在陈云首长身边担任警卫工作。能完成任务吗？”我们先是一愣，一时说不出话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会儿才会意地笑了，异口同声地回答：“能，保证完成任务！”接着由一位参谋带我们去见陈云首长。走进一间平房，见陈云首长正在伏案工作，油灯闪烁，映照着他清瘦的脸庞。看到我们进屋，陈云首长欠了一下身子，招呼我们坐下，便亲切地询问起来：“小钟，你的老家在哪里？”“在福建汀州。”“汀州，我去过。你家住哪条街？”“水东街。”“真巧，我前两年去汀州时也住在水东街。说起来我们曾经是邻居呢！”说完放声笑了。我们也笑了，笑得很开心。陈云首长与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发现时间不早了，才催促我们去睡觉。这一夜我们像回到了自己亲人的身边，带着甜蜜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陈云同志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奉命到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他中等个

子，面容消瘦但显得精神。他除了研究军事行动外，还要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很忙，但他总是乐观的，曾对我们说：“面前会有许多艰难险阻，但我们党和红军是不怕困难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以身作则地带领大家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离开苏区，困难之一是给养问题，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常常是风餐露宿。我们警卫人员除了保证首长的安全外，还要照顾好首长的生活。一到宿营地，我们先找来几块木板，往石头上一架，铺上稻草，算是床铺，急行军时，事先做好第二餐饭，由于天气寒冷，中途停留吃饭时，我想到老百姓家把饭热一热，陈云首长执意不要，风趣地说：“吃到肚里自然就热了！”到了晚上，我端上一盆热水，好让首长烫烫脚，驱除一天行军的疲劳。可陈云首长常常提前用凉水洗脚，为的是好让我们早些休息。他与大家同甘共苦，带领广大指战员去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从出发转移到十一月下旬，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在革命危急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陈云等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占领湖南通道城后，立即转向贵州。十二月中旬攻克贵州黎平。部队作短暂休整后，强渡乌江，一九三五年初攻占了遵义城。

遵义是黔北重镇，象我们汀州一样有新城、老城之分，老城是古代“夜郎城”所在，为居民区，新城是后来发展扩建的经济商业区。就在这座古老的山城，党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党中央机关驻老城，陈云首长住新城，每天清早，陈云首长要步行二里多路，前往开会。会场在中央机关的楼房里，我们警卫人员在会场外围站岗。只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陈云首长与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一连几天，陈云首长总是处于沉思之中。看得出来，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集中批判了博古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陈云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会议通过了《决议》，重新肯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当时最迫切、最紧急的军事指挥。正如陈云同志所说：“遵义会议，毛主席又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了。这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部队移师北上，一月下旬在土城击溃贵州军阀侯之担的三个团，为了甩掉前来增援的敌人，我军决定当晚渡过赤水河。命令一下，陈云首长立即指挥抢修浮桥。只见他脱掉鞋袜，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与战士们一起搬运木头，在陈云首长的指挥和带领下，浮桥很快架好了，部队迅速渡河前进。这时，收容队前来汇报：有几十个伤员还没安置好。陈云首长果断地说：“快找地下党协助，将伤员安置在当地群众家里养伤。”过了一段时间，群众抬着几十付担架来了。陈云首长亲自安置伤员，我提着马灯跟在后面，只见他象一位慈祥的母亲，耐心地劝说伤员要安心养伤，将来重返部队杀敌立功。一整夜，陈云首长处于指挥第一线。天拂晓，全军渡过赤水河，踏上了川南土地。

此次军事行动，我军准备从泸州和宜宾间北渡长江，与活动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示，发动陕南战役，致使敌人得以沿川贵边布防。敌人派重兵严密封锁长江，后面派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尾追而来。中央军委看到敌人重兵云集，渡江

已不可能，就当机立断，暂时改变北渡长江计划，命令红军由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的扎西集中，然后突然东进，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并抓住有利战机，在娄山关和遵义地区歼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了遵义城，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后来，毛主席又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直逼贵州，把所有追堵的国民党军队抛在后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部队来到金沙江畔，只见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大浪咆哮，似一条巨蟒在我们面前奔腾。渡江之前，陈云首长召开了一次短暂的会议，成立了渡江指挥部。部队分头去寻找船只船工，经过几小时紧张工作，终于找到了十几条大舢板船。陈云首长亲临渡口，指挥部队有秩序地渡江，每条船三、四十人，日夜不停地抢渡。白天，敌机在头上盘旋，但由于山高，敌机无法低飞，发现不了我们，倒象是为我们“送行”来了。夜间，两岸以火堆为号，一连几个昼夜，部队才全部渡过金沙江。由于劳累，陈云首长两眼布满了血丝，脸夹也显得更消瘦了，我们曾劝他休息，他说：“我们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哪有功夫休息，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现在苦点累点也值得啊！”

五月下旬，部队飞夺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有一天，陈云首长对我们说：“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你们到党中央办公厅听候安排吧！”我们低下头，心里难过得很，陈云首长用温暖的双手抚摸着我们的肩膀，慈爱地端详着我们，说：“别难过，革命者四海为家，将来我们会见面的！”临分别时，他将文件箱、行李交给我们，转送党中央张闻天书记收，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询问陈云首长的消息，盼望着能再见到他，回到他身边工作。后来才知道他是奉命去白区领导革命工作，我们想起白区的斗争环境是十分险恶、复杂的，更增添了几分对首长的思念之情。

离开陈云首长后，我一直担任党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跟随党中央爬雪山、过草地，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步路。每当回忆起长征路上在陈云首长身边工作的情景，陈云同志那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不断前进！

（汤家庆整理）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略谈长汀的扩大红军

王 其 森

今年十月，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红一方面军的成长、壮大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二千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发展为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八万六千余人。红军在中央苏区六年增长四十倍，充分说明其兵源来自根据地的广大青壮年。

长汀，是中央苏区的腹地，当时划为三县一市，即长汀县、兆征县、汀东县和汀州市。县、市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为补充正规红军的兵源，在开展扩大红军工作中成绩卓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授予“扩大红军的模范长汀县”奖旗。

一

保卫红色政权，是扩大红军的最根本目的。革命前，长汀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团防的压榨，封建地主的剥削。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地租、高利贷剥削相当严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迫使广大劳苦大众背井离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长汀三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有着许多血泪斑斑的家史和村史。

一九二七年，长汀有了共产党，秘密地领导人民闹革命。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解放了长汀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镇压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又建立了区、乡一级的红色政权，全县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热潮。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为农民土地所有权，广大的贫苦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从而，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彻底解决了农民的主要问题即土地问题。

党领导人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解决了农民盼望已久的土地问题，劳苦群众翻了身，当了家，作了主人。确实团结了千百万的工农群众。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夺取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是全苏区人民的共同目的。因此，扩大红军，参军参战是全苏区人民的本份，是广大青壮年应尽的义务。

二

广泛深入宣传发动，是扩大红军的最佳方法。苏区人民当家作主，分得土地，激发了劳动积极性，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为了保卫、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就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

每当扩大红军的任务下达后，县、区、乡各级领导总是把它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排上议事日程，从“加强党团的领导出发，召集县一级的机关联席会议，具体讨论各种有效办法，组织强有力的突击队到各区去。”一、通过召开积极分子活动会、茶话会，畅谈苏区的革命形势，报告前方打仗的胜利消息，鼓动大家为保卫红色政权出力。二、组织苏维埃剧团演出《反对拖尾巴》、《武装上前方》、《一双草鞋》、《做先锋的劳动妇女》等剧目，鼓动青壮年当红军，告诫基层干部做好支前工作。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民歌）开展宣传鼓动，如：“山歌开口句句真，告知老妹两事情，订亲要订好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我送丈夫当红军，送条毛巾寄深情，毛巾印上七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这些山歌一唱开，最能吸引群众，宣传效果很好。四、集中各区的模范营训练三至五天，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特别是对于目前战争形势与赤少队战斗任务，作深入的宣传鼓动，提高队员的战斗情绪。

经过经常性、多样性、灵活性的宣传鼓动，每次扩大红军，都涌现出了许多父送子、母送儿、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如：濯田区模范营整连加入红军；南阳区一次六十一人报名当红军；红坊区慈坑乡劳动妇女代表会指导员钟玉英，不但鼓动儿子当红军，还宣传本乡其他十人报名当红军；洪山区女代表胡妹邀四个女同志到游击队，鼓动自己的丈夫当红军，结果不仅她们的丈夫都报名当红军，而且带动了整个游击队加入红军。

总之，长汀的扩大红军工作，在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开展得比较活跃的。就在长征前夕的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红色中华》报还刊出：“长汀正向着超计划的道路迈进！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已达一千二百九十二名。”涌现出许多扩大红军的模范乡、模范区。红坊区在扩大红军运动中成绩显著，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扩红模范区”的光荣称号。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加热烈，全乡百分之百的青壮年参加红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亲临检查指导工作，并授予“保卫苏区而战”扩大红军奖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奖给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长汀县”大红奖旗。各种奖励，给了长汀人民极大的鼓舞。

三

解决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是扩大红军的主要措施。

当红军最光荣。到前方打仗，家属怎么办？这是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会考虑的，也是红军战士的切身利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十八条，《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十条。为优待红军及红军家属作了具体的规定。

长汀、兆征、汀东、汀州等县市，积极宣传贯彻“两个”条例。通过报纸、杂志、墙报，公布“两个”条例和优待红军家属的重要问答，使大家知道：“红军战士和贫苦农民一